

按季進呈御覽與清代摺紳錄的刊行

劉錚雲*

本文從吏部進呈摺紳御覽的角度切入，檢視清代摺紳錄的刊行，說明吏部進呈御覽《爵秩全覽》與書鋪刊印《摺紳全書》的關係與過程。清代職官名錄文武職分冊；大致而言，文職官錄有二類：一稱作《摺紳全書》，一稱作《爵秩全覽》；武職官錄只有一種，稱作《中樞備覽》；一般統稱「摺紳錄」，也有作《摺紳冊》者。雖然學者多指出清代摺紳錄有官刻與坊刻之別，但對於吏部按季進呈摺紳的來龍去脈並未著墨。此一缺憾對我們瞭解清代摺紳錄的刊行不無影響。

本文指出，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1773/3/2），江南道監察御史費南英奏請嚴禁書坊刊刻摺紳錄，並勅下吏、兵二部，將文武職官名銜派委司務等官，隨時校核，遵工刊印，按季進呈御覽，頒發各坊售賣。本文擬從費南英的這份奏摺切入，探討吏部進呈御覽的緣由、時間、進行的步驟等問題，並以此為基礎檢視清代摺紳錄的刊行；另外也對現存明代的摺紳冊，以及清代摺紳錄始於何時與刊刻摺紳錄之琉璃廠書鋪等問題，就新出資料略作補充，希望能有助於我們對摺紳錄的進一步瞭解。

關鍵詞：摺紳錄 《爵秩全覽》 《摺紳全書》 《中樞備覽》 費南英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清代職官名錄文武職分冊；大致而言，文職官錄有二類：一稱作《摺紳全書》，一稱作《爵秩全覽》；武職官錄只有一種，稱作《中樞備覽》；一般統稱「摺紳錄」，也有作「摺紳冊」者。由於摺紳錄詳載中央與地方大小衙門官員的姓名、籍貫、旗分、出身、任職年月等資料，且年年四季出刊，有學者認為是很有價值的傳記史料。¹ 此外，有些摺紳錄還登載〈封典〉、〈滿漢官員品級〉、〈赴任憑限〉、〈王公百官接見禮儀〉、〈驛站路程〉、〈職官總目〉等資料，查考便利。由於摺紳錄存世不多，流傳不廣，各重要圖書館雖有收藏，² 但無一收藏完整，不易利用。二〇〇八年在大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支持下，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九十五冊的《清代摺紳錄集成》。這部書是將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八朝的二百一十三種摺紳錄影印出版；其中最早的是雍正四年（1726）的《爵秩新本》，最晚的則是宣統四年（1912）春季分的《職官錄》。雖然有人因為這部未將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典藏的摺紳錄一起收進而批評它「支離破碎」，浪費了寶貴的經費，³ 但這部書的出版至少對研究者在利用摺紳錄的方便性上邁進了一大步。

可能因為使用不易，雖然早在三十年前，張英宇在查閱了北京十五個主要圖書館上百函數千冊清代摺紳錄後，於《文獻》上發表〈清代摺紳錄略考〉一文，⁴ 扼要介紹清代摺紳錄的形制、內容、刊刻的書鋪，但似乎後繼無人，直到大象出版社出版《清代摺紳錄集成》前夕，才讓學者再度關注清代摺紳錄。二〇〇八年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劉薈在《圖書館雜誌》上發表〈榮錄堂與清代摺紳錄之出版〉

¹ 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 563-567。

²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202 種，最早為順治十八年；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175 種，最早為乾隆七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153 種，最早為康熙五十四年；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211 種，最早為雍正五年；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 217 種，皆為同、光、宣三朝；日本東洋文庫藏 88 種，最早為乾隆三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131 種，最早為乾隆二十二年。詳見劉薈，〈榮錄堂與清代摺紳錄之出版〉，氏著，《清華園裡讀舊書》（長沙：岳麓書社，2010），頁 191-19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86 種，最早為乾隆二十九年，最晚為宣統三年。

³ 鍾少華，〈支離破碎的《清代摺紳錄集成》〉，《博覽群書》2010.10：66-68。

⁴ 張英宇，〈清代摺紳錄略考〉，《文獻》1984.1：116-124。

一文，以榮錄堂為例，概要敘述清代摺紳錄的形制、內容與出版狀況。⁵ 馮立昇在為《清代摺紳錄集成》寫的〈前言〉中，介紹摺紳錄從明到清的刊行、內容、價值和功用，以及早年學者對它的關注與利用。⁶ 闕紅柳於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三日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清華大學藏清代摺紳錄的特點與價值〉一文，隨後以此文為基礎在《清史研究》上發表〈清代摺紳錄的內容、特點與史料價值探析〉。⁷ 這三篇論文都讓我們對清代的摺紳錄的理解更上層樓。除了一般摺紳錄的形制、內容與出版情形外，劉文介紹美國哈佛大學哈燕圖書館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等重要圖書館有關摺紳錄的收藏數量；馮文讓我們注意到清人筆記及來華傳教士對摺紳錄的記載，以及著名學者如鄭振鐸、何炳棣對摺紳錄的關注與應用；闕文則提醒我們摺紳錄在編輯地方志上的史料價值。上述張英宇等四位學者雖然都指出了清代摺紳錄有官刻與坊刻之別，但對於吏部按季進呈摺紳的來龍去脈並未著墨。此一缺憾對我們瞭解清代摺紳錄的刊行不無影響。因此本文擬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典藏之內閣大庫檔案資料，探討吏部進呈御覽的緣由、時間、進行的步驟等問題，並以此為基礎檢視清代摺紳錄的刊行；另外也對現存明代的摺紳冊，以及清代摺紳錄始於何時、刊刻摺紳錄琉璃廠書鋪等問題，就新出資料略作補充，希望能有助於我們對摺紳錄的進一步瞭解。不過，由於武摺紳錄的本子較少，本文的舉證將限於文摺紳錄。

二・坊刻摺紳錄

明代即有書鋪刊刻摺紳錄。張秀民指出，明代北京書坊可考的有十三家。萬曆十二年（1584）北京鐵匠胡同葉舖刊印《真楷大字全號摺紳便覽》與《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正佐首領全號宦林便覽》；崇禎年間，洪氏劄齋刻摺紳冊，⁸

⁵ 劉蕃，〈榮錄堂與清代摺紳錄之出版〉，《圖書館雜誌》2008.10：63-68；後收入氏著，《清華園裡讀舊書》，頁187-202。

⁶ 馮立昇，〈前言〉，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編，《清代摺紳錄集成》（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第1冊，頁1-8。

⁷ 闕紅柳，〈清代摺紳錄的內容、特點與史料價值探析〉，《清史研究》2012.2：146-149。闕紅柳另有一文，內容相近，惟論述角度不同，見〈摺紳錄與清代北京〉，《北京檔案》2013.10：55-57。本文承王一樵提示，特此致謝。

⁸ 此摺紳冊的書名，張英宇文中作《新刊詳注摺紳便覽》，參氏著，〈清代摺紳錄略考〉，頁121。

共同開啟清代琉璃廠書鋪刊刻發行摺紳錄之先河。⁹ 張英宇指出，這三本摺紳錄收藏在北京圖書館，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馮立昇則指出，不僅國家圖書館藏有明代摺紳錄，北京市文物局還藏有嘉靖的摺紳錄殘冊。其實日本筑波大學圖書館也藏有二冊萬曆年間由北京正陽門裏東城牆下湖廣史氏刊行的摺紳錄，分別是《新刊全號宦林便覽》與《新刊大字全號縉紳便覽》。¹⁰ 因此，明代販賣摺紳錄的書坊當不只兩家，而可考的書坊應有十四家。

清代摺紳錄始於何時？上述張英宇等四位學者都未處理這個問題。不過，張英宇與馮立昇都提到了一本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曾為紀昀（1724-1805）收藏過的順治十八年（1661）的摺紳冊。這可能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清代摺紳錄。這本順治摺紳冊在文獻上屢被提及，先是由紀昀收藏，道光年間轉為韓泰華收藏，後來又為潘祖蔭（1830-1890）收為家藏，遞藏脈絡清楚，且有各家的題跋、題詩、看款。潘祖蔭為此寫了〈順治十八年摺紳冊〉一文，收入其《滂喜齋藏書記》；除了略述內容外，完整抄錄翁方綱（1733-1818）、法式善（1753-1813）、阮元（1764-1849）、丁嘉葆（?-1848）等人的跋語，以及朱珪（1731-1806）、邵懿辰（1810-1861）、吳存義（1801-1868）等人的詩文、看款。¹¹ 這些跋語提供了不少資訊，有助於我們瞭解這本摺紳冊的大致樣貌。根據潘祖蔭與法式善的跋語，我們知道這本摺紳冊是京師正陽門外西河沿洪家，也就是洪氏劄劄齋的刊本，因為是書卷後有「雕板於京師正陽門外西河沿浙江洪氏書坊」印記。¹² 翁方綱以辛丑科庶吉士「諸人皆空板未填」，不像「戊戌、己亥庶吉士皆備載字號」，認定這本摺紳冊為「辛丑歲之書也」。¹³ 換言之，這是一本順治十八年的摺紳冊。阮元指出，這本摺紳冊「於都察院既列總督、巡撫矣，而各外省又重列之，已駸駸乎不列於京職，故冊首葉題曰新刊」。¹⁴ 姑不論書坊是有此意，阮元的跋語讓我們知道這本摺紳冊的全名有「新刊」二字，或許就作《新刊順治摺紳冊》。朱珪在其題詩

⁹ 張秀民，〈明代北京的刻書〉，《文獻》1979.1：298-309；另見氏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255。

¹⁰ 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筑波大學和漢貴重圖書目錄》（茨城：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1996），頁114。

¹¹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926冊），卷一，〈順治十八年摺紳冊〉，頁28b-33a。

¹²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一，〈順治十八年摺紳冊〉，頁28b, 30a。

¹³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一，〈順治十八年摺紳冊〉，頁29b-30a。

¹⁴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一，〈順治十八年摺紳冊〉，頁31a。

中提到，「序言丙戌訖辛丑」。¹⁵ 這提示我們這本摺紳冊有一序言，而時間繫於丙戌，亦即順治三年（1646）。我們是否可以因此推定，正陽門外的洪氏書坊在順治三年就開始刊印摺紳錄了？

目前雖然未見順治三年的摺紳錄，但光緒年間，賞加二品頂戴按察使銜河南候補道易順鼎（1858-1920）撰輯了一本《順治丙戌摺紳錄略》。¹⁶ 全書僅有一卷，十四頁，列出親王以下，內三院、翰林院等部院尚書、侍郎，以及順天、直隸山西等省總督、巡撫與提督、總兵官等名銜、出身、旗分、籍貫等資料，但未見序文與書坊刊印相關資料，也不見易順鼎交待其撰輯的根據與經過。這不禁讓人懷疑這本從未見人提及，二百多年後突然冒出來的輯本的真實性。然而，即使這本輯略是有人因為上述洪氏書坊刊刻的摺紳冊有「序言丙戌訖辛丑」這個詩句而作偽，這仍顯示至少當時人相信應該是有這麼一本順治三年的摺紳冊。方濬師（1830-1889）在其《蕉軒隨錄 續錄》中即作此推論：「紀文達公昫家藏順治間摺紳一部，按其序文，始於順治丙戌。蓋自甲申定鼎，至丙戌年方有刊本，見吳香亭侍郎文集。」¹⁷ 因此，清代不無可能於順治三年時即有書坊刊刻摺紳錄了。

三·官刻摺紳錄

如果清代的坊刻摺紳錄開始於順治三年，清代的官刻摺紳錄又始於何時？張英宇與馮立昇都引光緒十九年（1894）十二月李鍾豫（1859-1930?）為松竹齋、榮寶齋合刊的《大清摺紳全書》所寫的序文來說明清代摺紳錄有官刻與坊刻之分，「爵秩全覽」是官刻本的正式名稱。¹⁸ 李鍾豫在其序言中指出，「國家設官分職，吏部刊刻摺紳，按季進呈，典至重也。獨是官版難得，而坊本遂盛行於天

¹⁵ 吳玉綸（1732-1802）也曾為此摺紳冊題跋，其中也提到，「按其序文肇於順治丙戌」。見氏著，《香亭文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51冊），卷一二，〈舊本摺紳跋〉，頁3。

¹⁶ 易順鼎撰輯本書時自署的頭銜是「賞加二品頂戴按察使銜河南候補道」。根據秦國經，《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第6503冊，易順鼎於光緒十三年授河南試用道，十六年賞加按察使銜，二十六年授廣西右江道。參易順鼎，《順治丙戌摺紳錄略》（收入氏著，《琴志樓叢書》）。

¹⁷ 方濬師，《蕉軒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五，頁169。

¹⁸ 張英宇，〈清代摺紳錄略考〉，頁117；馮立昇，〈前言〉，頁4。

劉錚雲

下」。¹⁹ 但是吏部按季進呈《爵秩全覽》的制度究竟始於何時？出於何人之意？目的何在？李鍾豫未提，張與馮也無意深究。李提及「官版難得」，以致「坊本遂盛行於天下」。其實，吏部之所以會按季進呈官版摺紳實因坊本濫刻而起。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1773/3/2），江南道監察御史費南英上了一個摺子，奏請禁書坊濫刻縉紳，以重官制。他指出：²⁰

詎無賴射利之徒，如琉璃廠等鋪家，濫行刊刻，名曰摺紳全書，訛謬相傳，不一而足。

隨後他列舉了幾個訛謬的例子：

查得在京衙門有已故數載之編修沈榮仁、²¹ 部員祁杲等，其銜名尚俱列入；又有部員樊元勳並未到任供職，亦列入銜名；至于久經陞調離任而銜名仍列原官者不可枚舉；而且載入外省錢糧款目並不照部定額數，任意舛錯；甚至字畫錯訛，廟諱不知遵避，種種紕謬。

接著他進入這本摺子的重點：

京師為總會之地，凡各省官民出都者，悉價買帶往，不惟直省據為考信，即遐陬僻壤咸奉為科律。計每歲印板出售不下數萬本。若此錯謬傳觀有關國體，則鋪家之私刊應請嚴行禁止。但職官一書具載每月陞遷、除授、姓氏、籍（籍）貫并爵秩等威、程途期限，理宜慎重校刊，詳布中外。合無仰祈聖恩，勅下吏、兵二部，將文武職官名銜派委司務等官，加意隨時校核，遴工刊印，按季進呈御覽，頒發各坊售布，庶流傳中外，展卷詳明，不致承訛襲謬，益昭體制。

費南英顯然認為，雖然書鋪私刊摺紳全書多有錯誤，理應「嚴行禁止」，但是考量其刊載職官每月的陞遷除授以及姓氏、籍貫、爵秩儀程與赴任程途期限等重要資料，摺紳一書還是應該「慎重校刊，詳布中外」。因此，他向乾隆皇帝提出兩項建議：一是勅吏、兵二部派員將文武職官名銜隨時校核，遴工刊印，按季進呈

¹⁹ 見光緒二十年夏季分松竹齋、榮寶齋合刊《大清摺紳全書·中樞備覽》。

²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以下簡稱〈明清史料〉），登錄號 204153-001。此件檔案係抄件，未繫年月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費南英原摺，具奏時間係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檔號 03-1171-015）

²¹ 沈榮仁，字勉之，浙江歸安人，雍正元年癸卯進士，乾隆五年以翰林院編修任四川學政。見法式善，《清秘述聞》（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一一，頁 366。目前所見其活動資料止於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初八日受乾隆賞賜緞一疋。見清·鄭澐修，邵晉涵纂，乾隆《杭州府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01-703 冊），首卷六，頁 46b。

御覽；²² 一是將進呈御覽後的職官名錄頒發各書坊販售，以廣流傳，庶不致以訛傳訛。乾隆皇帝同日批示：「該部議奏」。²³

很遺憾，有關吏、兵二部議覆的文字尚未尋著，無法確認中央對此建言的態度。不過，在史語所收藏的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吏部為辦理進呈春夏秋冬各季分摺紳而行文京師各單位，以及各單位回應的紀錄，時間則是上從嘉慶朝下至光緒朝，各朝都有。時間最早的一件是，嘉慶六年九月十八日(1801/10/25) 蒙古堂因為吏部辦理冬季摺紳而將該堂滿蒙漢「實缺中書十五員開寫旗分、出身」移付典籍廳轉行吏部。²⁴ 最晚的一件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 九月吏部為準備進呈冬季分摺紳咨送會典館的咨文。²⁵ 其中一件嘉慶十三年(1808) 吏部致內閣典籍廳的移會中，甚且明白指出，「查得摺紳一項，係每年各按四季進呈御覽之書，理宜字畫清楚，無錯無遺，方昭妥慎」。²⁶ 很顯然吏部一直照著費南英的建議，按季刊印職官名銜，進呈御覽。

檢視這些檔案資料，不難發現吏部一般是在每年的二至三月間為當年的夏季分摺紳行文各衙門，要求提供資料；五至六月間為秋季分摺紳，八至九月間為冬季分摺紳，十一至十二月間則為來年的春季分摺紳。吏部行文通常會以兩種方式要求各衙門提供資料：一是要各衙門提報所屬各官的全銜銜名、姓名、旗分、籍貫、出身，以及有無宮銜、世職、總理、管理兼銜與學差、倉差各項差使等資料；一是將相關衙門官銜、籍貫、旗分、出身等資料刊刻一份，咨送該衙門核對，如有陞遷、調補等事項，該衙門即在原冊註明後回覆。²⁷ 檔案資料顯示，從

²² 費南英按季進呈御覽的建言可能不是他的創見，而是沿襲明人的作法。根據《明實錄》，從弘治四年開始明人即有「略具諸臣履歷，按季進呈」的作法。《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三四七，頁6288。

²³ 根據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吏部造送月終冊》，奉旨之日為二月初十日，見〈明清史料〉，登錄號296763-054。

²⁴ 〈明清史料〉，登錄號229376-001。

²⁵ 〈明清史料〉，登錄號296073-001。當然這只是目前的觀察，這樣的資訊不是最後的定案，會隨著檔案的整理而變動。

²⁶ 〈明清史料〉，登錄號163650-001。

²⁷ 這份送請核對的資料究竟是吏部另行刊刻的，還是只是將上季的摺紳冊送請核對，有待驗證。目前只見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三件光緒三十四年的吏部知會軍機處的文明白指出以上一季的摺紳刷印一本，送請核對，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70083、166954、169798。但在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日吏部致軍機處的咨文中，仍然只是表明，「茲將官銜、籍貫、旗分、出身刊刻壹分，咨送貴衙門核對是否相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49735。

嘉慶以至同治朝，吏部都是以第一種方式要求內閣典籍廳詳細開載滿漢堂官與學士、典籍、中書等銜名、籍貫、旗分、出身等資料，造具清冊到部。不過，光緒朝的檔案卻顯示，吏部採用第二種方式，要求會典館與軍機處核對其所咨送的資料是否相符，並註明陞遷、調補等變動。這是否意味著吏部對不同的衙門採取不同的方式，抑或吏部官員只是到了光緒朝突然轉念，將行之有年的方式做了更動。由於資料有限且過於集中，現階段還無法判斷。

除了敘明提報資料的方式，吏部在給各衙門的行文中，還會提醒：「事關御覽之書，例應敬謹辦理，萬勿錯漏遲悞。」²⁸ 根據檔案所見，吏部給各衙門回應的時間不一，短則六天，多則二十天，但以十天居多。由於是進呈御覽之書，各單位想必會敬謹辦理，儘量配合。有些小單位如嘉慶朝的蒙古堂，二天之內就將所屬十五名人員的履歷資料交給典籍廳轉吏部，²⁹ 但還是有衙門未能及時交出清冊，還得勞煩吏部去文催促。嘉慶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1808/10/11），吏部因為已過期限未得回應，發文典籍廳即為一例。吏部於文中表示，為辦理預備進呈冬季摺紳，曾經行文咨取（各部院堂銜及各司司員掌印額外，以及小京官、筆帖式各官），「並聲明于十日內咨送本部，以便趕辦等因在案，迄今日久未據咨覆，相應再行片催，務于文到之日即速查明，照本部前咨詳細開單聲覆，以便辦理，萬勿再遲可也」。³⁰ 我們有幸找到吏部先前行文典籍廳咨取資料的檔案，得知發文時間是在八月初三日（1808/9/22），距其再次發文催交已有二十日，遠超過原訂十日移送的期程。³¹ 這個例子提供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一窺清代衙門間的互動。一方以「事關御覽之書」，要求萬勿遲延，一方似不為所動，仍按既定的步調辦事。³²

不過，這個互動過程也讓我們進一步瞭解吏部準備進呈四季摺紳的時程。吏部在其八月初三日的移會最後強調，「務於十日內移送（清冊）過部，以便詳細

²⁸ 嘉慶與光緒二朝稍有不同。前者用字較簡，作「另行付刻進呈，萬勿遲悞」；後者則刪去了「萬勿錯漏遲悞」等字。

²⁹ 〈明清史料〉，登錄號 229376-001。

³⁰ 〈明清史料〉，登錄號 224720-001。

³¹ 〈明清史料〉，登錄號 163650-001。

³² 同治年間延遲送件的情形似更嚴重。同治三年六月五日，吏部移會典籍廳：「再本部前經核會各衙門，清冊均照例限開送。近有遲至進呈之期始行咨送，本部礙難刊刻，以致呈書無以為准；且有遲至進呈後始行咨送到部者，殊屬遲延遺悞。」〈明清史料〉，登錄號 152288-001。

校對，另行付刻，趕辦冬季於立冬之日進呈」。³³ 這段文字透露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即嘉慶朝時吏部是在立冬之日進呈冬季分摺紳御覽。以此類推，春季分、夏季分與秋季分摺紳就應該分別在立春、立夏與立秋之日進呈御覽。咸豐七年(1857)的幾件移會可以進一步支持加強這樣的推想。讓我們先看咸豐七年八月二十三日(1857/10/10)吏部為準備進呈冬季摺紳事按例行文典籍廳的一件移會。這次吏部的行文不僅與前朝，甚至與同年五月間的行文相較，都有所不同，不僅用字精簡，而且全文以板刻刷印，僅在涉及時間的地方以手書填寫，現抄錄如下，以作說明：³⁴

吏部為咨取事。所有冬季摺紳應於立冬前十日彙齊校對刊刻，務於玖月初伍日以前開送過部。事關進呈，理宜敬謹，萬勿刻遲可也。須至咨者
右移會
內閣典籍廳

上述加底線字即為手寫填入的部份。三個月後，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三日(1858/1/7)，吏部為來年春季摺紳進呈之事行文內閣典籍廳；公文形式與內容幾乎一成不變，只是送部的時間做了相應的更動，並稍稍縮短了典籍廳的作業期程：「所有春季摺紳應於立春前十日彙齊校對刊刻，務於本月三十日開送過部。」³⁵ 次年六月九日(1858/7/19)與九月七日(1858/10/13)，吏部又為當年的秋季摺紳與冬季摺紳事分別行文典籍廳：

所有秋季摺紳應於立秋前十日彙齊校對刊刻，務於陸月拾伍日以前開送過部。³⁶

所有冬季摺紳應於立冬前十日彙齊校對刊刻，務於本月拾伍日以前開送過部。³⁷

這幾件檔案顯示，到了咸豐七年下半年，針對行之有年的按季進呈摺紳的公文作業，吏部事先刷就制式文字，以方便作業，爭取時效。另一方面，它也透露了吏部已定好時程，春、夏、秋、冬季分摺紳必須分別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十天完成彙齊、校對、刊刻等作業，方便於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時進

³³ 〈明清史料〉，登錄號 163650-001。

³⁴ 〈明清史料〉，登錄號 216440-001。

³⁵ 〈明清史料〉，登錄號 206441-001。

³⁶ 〈明清史料〉，登錄號 244020-001。「日以前」三字應是將「日」字挖補後填寫的。

³⁷ 〈明清史料〉，登錄號 244043-001。「日以前」三字應是將「日」字挖補後填寫的。

劉錚雲

呈御覽。這個作業時程應該不限於咸豐朝，而是各朝遵行的慣例。如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二日（1872/7/7），吏部為辦理秋季分摺紳行文內閣典籍廳，在文末不忘叮嚀：

如開送後，尚在立秋日以前，續有陞遷、調補，以及各項事故，亦即隨時咨明，以便補刊可也。³⁸

這句明白表示，如有任何因陞遷、調補等產生的人員更動，在立秋日以前，亦即秋季分摺紳進呈之前，希望該廳隨時咨明，以補刊入當季摺紳，俾使進呈御覽之摺紳提供最即時的官員動態，不致進呈時即已過時。

走筆至此，我們應可大致掌握吏部四季進呈摺紳御覽的時程。吏部每年於二到三月、五到六月、八到九月、十一到十二月間行文中央各部門，要求提報所屬官員的姓名、旗分、籍貫、出身，並指定提報期限，少則六天，多則二十天；吏部設定彙齊、校對、刊刻等作業要在進呈前十日完成，而每年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就是進呈摺紳的日子。

雖然吏部行文京中各衙門時都使用「準備摺紳」一詞，但根據咸豐元年正月二十五日（1851/2/25）內務府的一件奏摺抄件，最後進呈御覽的本子並無「摺紳」二字。茲抄錄該抄件如下：

總管內務府謹奏，為奏聞事。查京中大小衙門堂司各官銜名，向由吏部刊刻爵秩全書按季進呈。惟臣衙門堂司各官銜名不行開列，似未畫一。前蒙聖明垂詢。經臣柏葰奏准補行纂輯進呈。謹將本年春季臣衙門堂司各官銜繕成清冊，恭呈御覽。擬請嗣後臣衙門按季造冊，咨送吏部，由吏部附入爵秩全書內，列於工部之次，一體刊刻進呈，合併呈明。伏乞聖鑒 謹奏等因於咸豐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具奏。

奉硃批：知道了，冊留覽。嗣後每年四季著吏部照此次寫本刊刻，毋庸入於爵秩全覽，另為一冊。欽此。³⁹

這份抄件提供了二個重要訊息：一是吏部每年四季刊刻大小衙門各官銜名進呈之御覽的本子，內務府名之為「爵秩全書」，而咸豐皇帝的硃批則作「爵秩全覽」。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冊光緒丁未年（三十三年，1907）的《爵秩全覽》刻本，載有陝西、甘肅、福建、浙江、四川、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大小衙門各官銜名。全冊板框長 17 公分，寬 14.5 公分，黃

³⁸ 〈明清史料〉，登錄號 141881-001。

³⁹ 〈明清史料〉，登錄號 234331-001。

綾布面，版面清朗，全無塗改的墨釘；就裝幀形式而言，當屬宮中之物。上海圖書館則藏有乾隆四十二年冬、四十三年秋、嘉慶二年春、八年春的《爵秩全覽》。尺寸大小與裝幀形式（黃綾布面）都與故宮所藏類似。而且目前也未見到任何以《爵秩全書》為名的摺紳冊。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吏部應該就是以《爵秩全覽》為名進呈御覽。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內務府在奏摺中兩次提到吏部刊刻的「爵秩全書」，應非筆誤，而是當時官員習慣於公文書中二詞混用。例如，在二件同是因為吏部進呈摺紳冊犯錯以致官員議處的公文中，一用「爵秩全書」，一用「爵秩全覽」指稱摺紳冊。⁴⁰ 這可以說明何以在一份公文中，內務府官員二度使用「爵秩全書」一詞，而咸豐皇帝的硃批卻是「爵秩全覽」。

抄件的另一重要訊息則是在咸豐朝以前，內務府衙門的堂司各官銜名並未開列於吏部進呈之《爵秩全覽》內。而是在甫即位的咸豐皇帝問起後，由總管內務府大臣「柏葭奏准補行纂輯進呈」。咸豐皇帝是在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繼位，總管內務府大臣柏葭應該就是在這一年奏准補行纂輯進呈的。咸豐元年（1851）正月，內務府將衙門堂司各官銜名繕造清冊進呈的同時，奏請內務府衙門爾後按季咨送吏部，由其附入《爵秩全覽》內進呈。內務府是清代總管宮廷與皇室內朝事務的機構，由皇帝親領的上三旗包衣為其主要成員，與外朝部院寺監等衙門在性質上很不同。咸豐皇帝可能是基於這個考量，不要內務府的官司銜名附入吏部刊刻的《爵秩全覽》，而是「另為一冊」。這就說明了何以傅斯年圖書館會藏有單獨成冊的《內務府爵秩全覽》，⁴¹ 而廈門大學出版社亦曾出版二冊光緒年間之《內務府爵秩全覽》。⁴² 不過，內務府的職官名銜最終還是附入了《爵秩全覽》、但已是帝國末年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了。⁴³ 至於為何長時間內務府的名銜未列入進呈御覽的摺紳冊內？其用意何在？有無政治上的考量？由於未能掌握相關檔案，這些問題只能暫時擱此，有待將來求證。

⁴⁰ 前者係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中一件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和珅的奏摺抄件（登錄號 272804-001），後者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一件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都察院的奏摺錄副（檔號 03-1593-043）。

⁴¹ 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光緒二十年秋季分、二十三年秋季分、二十四年夏季分、二十七年冬季分的《內務府爵秩全覽》（光緒年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⁴² 參見王春瑜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一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第14冊。

⁴³ 目前所見最早載有內務府職官名銜的是光緒三十三年冬季的《爵秩全覽》，而三十三年春季的《爵秩全覽》尚未見登載內務府的職官名銜。

劉錚雲

至於兵部是否也是按季進呈武摺紳，即所謂的《中樞備覽》，由於未見相關檔案，也未見到官刻的《中樞備覽》，目前無法判斷。但根據檔案資料，武摺紳的《中樞備覽》的刊印要早於文摺紳的《爵秩全覽》。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間，內閣會典館為了編纂會典曾向武英殿發出咨呈，要求刷印一部《中樞備覽》，供其領取：

內閣會典館為咨呈事。查本館纂修會典，所有一切應用書籍向各衙門咨取業經奉准在案。今查《皇輿圖考》、《戎政全書》、《中樞備覽》本館現應查考，相應咨呈武英殿，即速照數刷印各一部，以便赴領可也。⁴⁴

顯然，兵部在乾隆三十八年費南英上奏之前即已編有《中樞備覽》，但是否按季刊刻則不清楚。不過，檔案資料顯示，兵部的確曾按季刊印過《中樞備覽》。例如，同治元年（1862）十月或十一月間，實錄館行文兵部，要求「所有道光三十年至咸豐十一年（1861）分四季武摺紳務于文到日檢齊送館」。兵部隨即行文滿漢蒙八旗都統，將上述期間內「在京八旗都統、副都統歷年官銜查明，逕行造冊，片覆實錄館」，並知照該部。咸豐皇帝是在道光三十年登基，咸豐十一年駕崩。實錄館此舉顯然是為了編纂咸豐朝實錄而來。上述二段引文即從同年十一月鑲黃旗漢軍都統給實錄館的咨文中抄出。⁴⁵ 這兩段文字清楚提示，兵部每年四季都編製武摺紳冊。而這些武摺紳冊應該就是以《中樞備覽》為名。很遺憾，目前所能見到的《中樞備覽》都是由書坊刊刻，單獨成冊，附於摺紳全書之後。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確定清代自嘉慶朝以來即有刊印文武職官名錄，而吏部也都按季刊刻《爵秩全覽》進呈御覽。雖然按季進呈御覽制度是否因為採納費南英的建言而開始實施，有待進一步驗證，但掌握此一事實對我們理解清代摺紳錄的刊行起了關鍵性作用。

四·刊行摺紳錄的書鋪

清代刊印摺紳錄的書鋪都集中在北京的琉璃廠。當時的琉璃廠位於正陽門之西，北起西河，南至臧家橋與孫公園；東起延壽寺街、桶子胡同，西至南、北柳巷。元、明、清三代均在此建有琉璃窯，故得名。⁴⁶ 上文所述刊印順治十八年摺

⁴⁴ 〈明清史料〉，登錄號 238692-001。

⁴⁵ 〈明清史料〉，登錄號 146214-001。

⁴⁶ 張涵銳，〈琉璃廠沿革考〉，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頁 1。

紳錄的洪家書坊當在琉璃廠之北緣，與乾隆以後的書鋪集中地有些距離，當然這其中的變化不是本文所能處理的。表一是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製作的自順治至宣統朝琉璃廠先後刊刻販售摺紳錄的書鋪名單，總數計有六十七家；⁴⁷ 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數目較少，僅有一至二家；乾隆、嘉慶朝數目相同，都是十三家；道光朝增加到二十二家；咸豐、同治朝數目減少，分別是十四家與七家；而到了光緒朝，數量激增到三十七家；宣統朝則只見四家。當然這樣的表列無法呈現有清一代刊刻摺紳錄書鋪的全貌，因為書鋪數目的多寡完全取決於摺紳錄的存世數量，當受不少歷史的偶然因素所左右，而且本文搜羅的資料也不完整，個人目前得以目見的摺紳錄僅有傅斯年圖書館與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的收藏，而且透過網路所查檢的圖書館目錄也很有限；尤其可惜的是，雖然張英宇查閱過十五個北京的重要圖書館，但他所錄的四十九家書鋪僅記其第一次出現的朝代，而不錄隨後各朝出現的紀錄。如表一所示，劄劄齋於順治、康熙時即刊印摺紳錄，但不見於乾隆以後各朝。這樣的表列其實是根據張氏與馮氏二人的紀錄。前者於文中列出四十九家刊刻摺紳錄的書鋪，劄劄齋名列第一，因為前述順治十八年的摺紳冊即為其所刊印。然而，後者指出，中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劄劄齋出版的康熙朝摺紳錄。由於張氏的四十九家列表僅列出第一次見到的書鋪，如果不是馮氏提到中國國家圖書館亦有康熙朝劄劄齋的摺紳錄，僅就張氏的表列，我們實無法得知劄劄齋於康熙朝持續出版摺紳錄。至於劄劄齋是否繼續於康熙以後各朝刊印摺紳錄，由於沒有張氏所見十五家圖書館的完整紀錄，目前無法得知。張英宇所見的北京各圖書館的收藏目前僅有中國國家圖書館、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圖書館等館可以從其網路上的目錄略窺一二。另外，孫殿起（1894-1958）與雷夢水所列出的十八家清末民初販售摺紳錄的書鋪（在表一中以斜體表示）也不完整。⁴⁸ 張英宇指出，在這十八家書鋪中，僅有崇錦堂不見於他閱讀過的十五家圖書館的摺紳錄，而表一中光緒朝有三十七家書鋪，尚有十九家未見於孫殿起的表中。

然而，即使如此，表一所列仍透露不少訊息。例如，乾隆朝的奎文閣，在嘉慶朝仍有出版紀錄；道光朝的聖經堂、富文堂、貴文堂、二酉堂等在咸豐朝也有出版實績。又如，根據張英宇，榮祿堂的摺紳錄首見於康熙朝，但我們親見及所

⁴⁷ 資料來源包括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史丹佛大學東亞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張英宇所錄四十九家（以中黑體表示）及孫殿起所錄十八家（以斜體表示）。

⁴⁸ 孫殿起、雷夢水，〈記廠肆坊刊本書籍〉，孫殿起，《琉璃廠小志》，頁186。

能掌握的目錄中，未見其於雍正、乾隆與嘉慶三朝刊刻的摺紳錄，而道光以迄宣統又都有刊印紀錄。有了剖劄齋的例子，不禁讓人懷疑榮祿堂可能並未於雍乾嘉三朝中斷出版摺紳錄，只是其刊刻之書未能存世，或仍深藏於北京某圖書館的角落，張英宇未曾指出。因此，榮祿堂不無可能是目前所見出版摺紳錄歷史最久遠的書鋪。再如表一所示，孫殿起所列十八家書鋪中的榮慶堂、榮錦堂、寶名堂、崇壽堂早自乾隆朝即已刊刻摺紳錄；榮觀堂、榮貴堂、貴名堂、榮寶齋、榮晉齋、崇名堂也從嘉慶朝即開始刊印摺紳錄；而榮華堂、榮顯堂、文英堂自道光朝起刊刻摺紳錄；榮錄堂、同文堂較晚，自咸豐朝開始刊印摺紳錄；斌陞堂則在同治朝才見刊刻紀錄。另外，表一也顯示，十八家以外的榮陞堂、文寶堂等都自道光朝起有刊印摺紳錄的紀錄。因此，就目前資料所見，在光緒朝的三十七家書鋪中，有高達半數（19/37）的店家有長期，亦即跨越二朝或三朝以上出版摺紳錄的紀錄，有些可能超過百年，甚至長達二百年以上。反過來說，表一中也有十八家，近半數的書鋪，是在光緒朝才開始經營摺紳錄的出版業務。這是否表示摺紳錄在光緒朝仍有很大的市場，吸引新商家的投入？

不過，必須指出，目前各圖書館中，光緒朝的摺紳錄以榮錄堂或榮祿堂刊刻的居多，而這兩個書鋪的關係撲朔迷離，令人摸不著頭緒。張英宇指出，光緒十年（1884）後，榮錄堂在其刻本的序中聲稱係從榮祿堂改名。⁴⁹ 劉蕃指出，同治九年（1870）夏季分、光緒二十年秋季分、三十年夏季分榮錄堂刊印的《摺紳全書》第一冊都夾訂了一頁紅印的〈榮錄堂起首老鋪記〉，以「『榮祿』二字嫌于僭妄，乃改『祿』為『錄』，亦合縉紳錄抄輯編纂成書之實」。⁵⁰ 徐珂的《清稗類鈔》也有相關記載，指出販售摺紳錄的南鋪，「其最初者為榮祿齋，旋以榮祿二字嫌於僭，乃改祿為錄」。⁵¹ 不過，根據美國哈佛大學哈燕圖書館收藏的榮錄堂刊刻的同治六年夏季分《大清摺紳全書》已有此〈老鋪記〉，而且此後刊印的同光兩朝榮錄堂《摺紳全書》都夾有此頁。但該館收藏的同治三年榮錄堂《大清摺紳全書》則不見〈老鋪記〉。因此，可以確定〈榮錄堂起首老鋪記〉的始刊時

⁴⁹ 張英宇，〈清代摺紳錄略考〉，頁123。

⁵⁰ 劉蕃，〈榮錄堂與清代摺紳錄之出版〉，頁198。〈榮錄堂起首老鋪記〉的相關文字是：「本堂原名『榮祿』，歷有年矣。繼思列棘槐而載籍，固足為榮；售棗梨以謀生，何敢言祿？且飾三間之門額，輒懸一品之封銜，雖壯觀瞻，終虞僭妄。爰更為『錄』，存鈔胥之實也，乃有店屬張新名。」

⁵¹ 徐珂，《清稗類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爵秩類〉，「爵秩全函」條，頁1264。

間當在同治三年至六年間。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目前同、光兩朝仍可見到榮祿堂刊印的摺紳錄。例如，榮祿堂與榮錄堂都曾刊印同治十三年冬季分的《大清摺紳全書》。前者封面頁的標籤寫著：「京都琉璃廠東門內／路南火神廟對過／榮祿堂四季較準／大小摺紳無訛」，而後者的標籤則作：「京都琉璃廠東門／中間路南榮錄堂／四季較準大小摺紳」。兩者對各自的所在位置表述不同。如果再對照〈老鋪記〉最後所標榮錄堂的位置——京都琉璃廠東北園對過便是——兩家書鋪明顯不在一處。讓我們再看光緒二十八年夏季分榮祿堂與榮錄堂刊印的《大清摺紳全書》。前者封面頁的標籤是：「第一冊 凡例／品級路程 職官禮儀／接見禮儀 例給封典／京官 京都琉璃／廠東頭路南榮祿堂」，而後者則是：「京都琉璃廠中間／路南榮錄堂四季／較準大小摺紳／第一本敘文凡例／封典官階品級／憑限路程職官／總目禮儀京官」。兩者明顯不同，似有意要作區隔。這中間究竟有何故事？著實讓人有如霧裡看花，看不清，也看不明。劉蕃雖然探討了榮錄堂的發展歷程，可惜她未處理這個榮祿堂其實與榮錄堂並存的問題。因此在找到更多資料以前，這個問題只能暫時擱置。

表一：刊刻摺紳錄書鋪一覽表

| 朝代 | 順治 | 康熙 | 雍正 | 乾隆 | 嘉慶 | 道光 | 咸豐 | 同治 | 光緒 | 宣統 |
|----|-----|-----|-----|-----|-----|-----|----|-----|-----|-----|
| 書坊 | 劄剛齋 | 劄剛齋 | | | | | | | | |
| | | 榮祿堂 | | | | 榮祿堂 | | 榮祿堂 | 榮祿堂 | 榮祿堂 |
| | | | 榮陞閣 | | | | | | | |
| | | | | 同陞閣 | | | | | | |
| | | | | 觀光閣 | | | | | | |
| | | | | 崇壽堂 | | | | | 崇壽堂 | |
| | | | | 五本堂 | | | | | | |
| | | | | 世錦堂 | | | | | | |
| | | | | 黎照閣 | | | | | | |
| | | | | 濂溪閣 | | | | | | |
| | | | | 榮綬堂 | | | | | | |
| | | | | 寶綬堂 | | | | | | |
| | | | | 奎文閣 | 奎文閣 | | | | | |
| | | | | 榮慶堂 | 榮慶堂 | | | | 榮慶堂 | |
| | | | | 榮錦堂 | 榮錦堂 | 榮錦堂 | | | 榮錦堂 | |

劉錚雲

| 朝代 | 順治 | 康熙 | 雍正 | 乾隆 | 嘉慶 | 道光 | 咸豐 | 同治 | 光緒 | 宣統 |
|----|----|----|----|-----|-----|------|-----|-----|-----|-----|
| | | | | 寶名堂 | 寶名堂 | 寶名堂 | | | 寶名堂 | |
| | | | | | 青雲齋 | 青雲齋 | | | | |
| | | | | | 榮觀堂 | 榮觀堂 | 榮觀堂 | | 榮觀堂 | |
| | | | | | 榮貴堂 | 榮貴堂 | | | 榮貴堂 | |
| | | | | | 貴名堂 | 貴名堂 | | | 貴名堂 | |
| | | | | | 榮寶齋 | | | | 榮寶齋 | 榮寶齋 |
| | | | | | 榮晉齋 | | 榮晉齋 | 榮晉齋 | 榮晉齋 | |
| | | | | | 崇名堂 | | | 崇名堂 | 崇名堂 | |
| | | | | | 聚錦堂 | | | | | |
| | | | | | 吉本室 | | | | | |
| | | | | | | 文英堂 | | | 文英堂 | |
| | | | | | | 聖經堂 | 聖經堂 | | | |
| | | | | | | 富文堂 | 富文堂 | | | |
| | | | | | | 貴文堂 | 貴文堂 | | | |
| | | | | | | 文寶堂 | 文寶堂 | | 文寶堂 | |
| | | | | | | 西二西堂 | | 二西堂 | | |
| | | | | | | 東二西堂 | | 二西堂 | | |
| | | | | | | 榮陸堂 | 榮陸堂 | | 榮陸堂 | |
| | | | | | | 榮華堂 | | | 榮華堂 | |
| | | | | | | 榮顯堂 | | | 榮顯堂 | |
| | | | | | | 文郁堂 | | | | |
| | | | | | | 文琳堂 | | | | |
| | | | | | | 英秀堂 | | | | |
| | | | | | | 本立堂 | | | | |
| | | | | | | 光裕堂 | | | | |
| | | | | | | | 榮錄堂 | 榮錄堂 | 榮錄堂 | 榮錄堂 |
| | | | | | | | 同文堂 | | 同文堂 | |
| | | | | | | | 炳蔚堂 | | | |
| | | | | | | | 大文堂 | | | |
| | | | | | | | 寶名齋 | | | |
| | | | | | | | 文茂堂 | | | |

| 朝代 | 順治 | 康熙 | 雍正 | 乾隆 | 嘉慶 | 道光 | 咸豐 | 同治 | 光緒 | 宣統 |
|----|----|----|----|----|----|----|-----|-----|------|------|
| | | | | | | | 文聚堂 | | | |
| | | | | | | | | 榮福堂 | | |
| | | | | | | | | 斌陞堂 | 斌陞堂 | |
| | | | | | | | | | 崇錦堂 | |
| | | | | | | | | | 寶善堂 | |
| | | | | | | | | | 文蔚堂 | |
| | | | | | | | | | 文萃堂 | |
| | | | | | | | | | 來鹿堂 | |
| | | | | | | | | | 松竹齋 | |
| | | | | | | | | | 點石齋 | |
| | | | | | | | | | 榮鑄堂 | |
| | | | | | | | | | 文富堂 | |
| | | | | | | | | | 順濟局 | |
| | | | | | | | | | 文華堂 | |
| | | | | | | | | | 懋德堂 | |
| | | | | | | | | | 善成堂 | |
| | | | | | | | | | 福潤堂 | |
| | | | | | | | | | 文采齋 | |
| | | | | | | | | | 一本堂 | |
| | | | | | | | | | 都學局 | |
| | | | | | | | | | 槐蔭山房 | 槐蔭山房 |
| 總計 | 1 | 2 | 1 | 13 | 13 | 22 | 14 | 7 | 37 | 4 |

資料來源：傅斯年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圖書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哈燕圖書館、史丹佛大學、日本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

這些書鋪之間是競爭，還是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目前沒有資料可以確切回答這個問題。劉薈指出，各書坊間似乎有某種默契，「每季只見一家書鋪印行，絕不重覆，不知是否存在過某種行業行規，現在還未見材料證實」。⁵² 但事實並非如此，她所服務的清華大學圖書館的收藏中，即可見到榮錄堂與榮祿堂刊

⁵² 劉薈，〈榮錄堂與清代摺紳錄之出版〉，頁 201-202。

劉錚雲

刻的同治十三年冬季分與光緒二十八年夏季分的《大清摺紳全書》。另外，斌陞堂與榮晉齋都曾刊刻同治十三年春季分的《大清摺紳全書》。前者藏於清華大學圖書館，後者則見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不過，這些書鋪之間似乎仍存在著某種關係，只是就像前述榮祿堂與榮錄堂一樣，外人看不透。例如，榮福堂刊印的同治十年（1871）夏季分《大清摺紳全書》第三本，頁利：七十八的版心作「榮副堂」，而非刊印書的「榮福堂」；第四本，頁貞：一的版心卻又是「榮錄堂」，而非「榮福堂」。前者「副」、「福」同音，可能是手民之誤，而後者「榮福堂」卻成了「榮錄堂」，當非手民之誤，但是借板？還是盜板？又如，文寶堂刊印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季分《大清摺紳全書》，其序文卻是由「榮顯堂」具名，而非刊行的「文寶堂」。這種情形又要如何解釋？是合作？還是侵權？這些書鋪的關係著實令人好奇。也有少數摺紳錄未標示出版書鋪名稱，如北京清華大學藏有一部完整的道光二十二年春季分摺紳錄。文摺紳的書衣上載：

京都琉璃廠本
書坊新刊四季
較準大小摺紳
大清摺紳全書 壬寅春季
本書坊梓

〈序〉後落款沒有署名，僅載明年月：「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冬季」。而武摺紳的書衣上同樣未標示書鋪名號，僅作：

大清中樞備覽 壬寅春季
本書坊梓

〈序〉後也是沒有署名，僅作「本堂謹識」。這無疑是一部盜版的摺紳錄。像這樣的盜版現象在當時應該相當普遍。否則，榮錦書坊不會在書名頁上指出，「盜襲翻板」之書，「字畫錯訛，魚魯莫辨；請買者詳鑒甄別，則知翻板之書不足觀也」。⁵³

⁵³ 《爵秩新本》（乾隆二十九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五·摺紳錄的形制

上文提到，乾隆三十八年以後吏部按季進呈御覽《爵秩全覽》。雖然我們無法確知吏部、兵部的後續作為，無法知道吏、兵二部是否照費南英的建議「頒發各坊售布」，但觀察各朝坊刻摺紳錄，可以發現乾隆三十八年以後，清代各書坊摺紳錄的形制有一明顯的變化，即由多樣趨向單一化。

首先讓我們看各書鋪對摺紳錄的命名。上文提及費南英指出，「琉璃廠等鋪家，濫行刊刻，名曰摺紳全書」。但是根據目前所見摺紳錄，乾隆三十八年以前刊刻的摺紳錄名稱頗為多樣。表二是目前所見乾隆朝各書鋪刊刻摺紳錄時所用的書名。如表二所示，乾隆三十八年以前各書鋪所用的摺紳錄名稱頗不一致，如榮錦堂仍沿用榮陞閣的「爵秩新本」；不知名的書鋪用「縉紳新書」；觀光閣用「大清仕籍全編」；同陞閣用「滿漢縉紳全本」；寶名堂則用「大清職官遷除全書」與「大清職官摺紳全書」。寶名堂的例子顯示，即使同一書鋪也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稱。寶名堂刊行的「大清職官遷除全書」與「大清職官摺紳全書」分別刊刻於乾隆二十九（1764）、三十年。然而，到了乾隆三十九年以後，表二所列書鋪刊印的摺紳錄都以「大清摺紳全書」為名。而到了嘉慶朝，寶名堂與榮慶堂都改用「大清摺紳全書」。此後一直到光緒中葉，幾乎所有的書鋪都只用「大清摺紳全書」或加上「袖珍」二字的「大清袖珍摺紳全書」作為摺紳錄的書名。後者是書鋪為了方便攜帶，而刊刻的巾箱本摺紳錄。不過，光緒年間常見榮錄堂另以「爵秩全函」刻行摺紳錄，同樣的書鋪如果刊印的是巾箱攜帶本，也會加上「袖珍」兩字，成為「袖珍爵秩全函」。然而，光緒中葉以後，不少書鋪刊印的摺紳錄是「大清摺紳全書」與「爵秩全覽」混用。例如，松竹齋與榮寶齋合刊的光緒二十（1894）、二十一年摺紳錄，書衣題名作「爵秩全覽」，書名頁題名卻作「大清摺紳全書」。光緒三十年，榮寶齋獨自刊行的摺紳錄，也是書衣題名作「爵秩全覽」，書名頁題名卻作「大清摺紳全書」；但三十二年的書衣與書名頁題名卻又均作「大清摺紳全書」。另外，榮祿堂刊行的光緒二十八、三十二年摺紳錄，書衣題名作「爵秩全覽」，而書名頁題名作「大清摺紳全書」，但三十、三十三年，無論是書衣題名或書名頁題名都作「大清摺紳全書」。乾隆三十八年以後各書鋪刊刻摺紳錄所採用的書名漸趨一致，原因不明，但有無可能是因為資料來源一致，各書坊沒有必要在書名上作文章，以強調其所售摺紳錄的重要性？

表二：乾隆三十八年前後書鋪刊刻摺紳錄名稱一覽表

| 時間 書鋪 | 乾隆三十八年以前 | | 乾隆三十八年以後 | |
|----------|----------------------|-------------------------------|-------------------------|-------------------------------------|
| | 題名 | 刊印時間 | 題名 | 刊印時間 |
| 佚名 | 縉紳新書 ⁱ | 乾 13 春 | | |
| 同陞閣 | 滿漢縉紳全本 ⁱⁱ | 乾 25 冬、26 秋 | | |
| 寶名堂 | 大清職官遷除全書 | 乾 29 夏 | | |
| 寶名堂 | 大清職官縉紳全書 | 乾 30 春 | | |
| 寶名堂 | | | 大清摺紳全書 | 乾 40 冬、 48 夏、 50 秋、 51 春、秋 |
| 觀光閣 | 大清仕籍全編 | 乾 32 | | |
| 榮錦堂 | 滿漢爵秩全本 | 乾 32 春 | | |
| 榮錦堂 | 爵秩新本 | 乾 29 冬、 30 冬、31 秋、 33 秋 | | |
| 榮錦堂 | | | 大清縉紳全書 | 乾 39 夏、 48 春 |
| 世錦堂 | | | 大清縉紳全書 | 乾 42 秋 |
| 榮慶堂 | | | 大清摺紳全書 | 乾 53 春 |
| 榮慶堂 | | | 大清袖珍摺紳全書 ⁱⁱⁱ | 乾 51 冬 |
| 濂溪閣 | | | 大清摺紳全書 | 乾 57 春 |

ⁱ 依據凡例頁題名

ⁱⁱ 書衣題名作「滿漢摺紳全書」

ⁱⁱⁱ 書衣題名作「大清摺紳全書」

其次，讓我們看各摺紳錄的序與凡例。一般而言，書鋪刊印的摺紳錄在書名頁之後都會有一篇序文。目前個人所見的乾隆朝摺紳錄分別由同陞閣、榮錦堂、寶名堂、世錦堂、西榮慶堂、濂溪閣等書鋪刊行。同陞閣刊行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 冬季分、二十六年秋季分的序文都是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葉一棟署名；榮錦堂刊行的四年、二十九年冬季分、三十年冬季分、三十三年秋季分的序文都是由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加一級余棟署名（乾隆四年時的官銜是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加一級）；世錦堂刊行四十二年秋季分的序文是由山東學政黃

登賢署名；寶名堂刊行的二十九年夏的序文有二篇，第一篇是由寶名堂主人署名，以「是書曷昉乎爾」起首，第二篇則和榮錦堂一樣是由余棟署名。不過，不知何故，三十年春則不見余棟的序文，僅有以「是書曷昉乎爾」起首的寶名堂主人署名的序文。有趣的是，榮錦堂乾隆五十八年春季分的序文也不見余棟的序文，同樣是以「是書曷昉乎爾」起首的世錦堂主人署名的序文取代。榮慶堂刊行的五十三年春季分的摺紳錄未見序文，僅有乾隆元年的上諭；濂溪閣刊行的五十七年春季分的序文僅署名本堂主人。而嘉慶朝以後直到宣統朝，各書鋪幾乎都是用此「是書曷昉乎爾」起首，各書鋪主人署名的序文，再也未見余棟、葉一棟、黃登賢等人，或是其他官員的序文。

至於凡例，情況類似，但稍為複雜。一般而言，每本書鋪刊刻的摺紳錄在序文之後都會有一「凡例」，說明資料的來源、體例的依據等。早期的條目較簡，如不知名書鋪刊印的乾隆十三年（1748）春《摺紳新書》僅有凡例十一條。⁵⁴十二、三年後，同陞閣刊印的乾隆二十五年冬季分、二十六年秋季分《滿漢縉紳全本》的凡例增為十五條。到了寶名堂刊印的乾隆二十九年夏《大清職官遷除全書》與三十年春季分的《大清職官縉紳全書》，凡例的條目增為二十六。可是同一時間榮錦堂的乾隆三十年冬季分與三十三年秋季分的《爵秩新本》仍然維持只有十一條目的凡例。數年後的世錦堂乾隆四十二年秋季分的《大清摺紳全書》也改成了二十六條目的凡例。而榮錦堂的乾隆五十八年春季分《大清摺紳全書》的凡例同樣也變成了二十六條目。二十六個條目的凡例一直維持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光緒二十二年以後刊印的摺紳錄的凡例都增加了二個條目，而這個二十八條目的凡例一直保持到清帝國結束。

相較之下，吏部進呈摺紳形制的變化不大。首先就名稱而言，吏部始終都是以《爵秩全覽》進呈。《爵秩全覽》除了書衣外，沒有書名頁，沒有凡例，直接以「宗人府」開始。中央各部院結束後，由直隸省領頭進入地方各省；分裝上下兩冊。惟一有變化的是，直隸省以外各省的排列次序，即使是同一朝代也未見一定的先後順序。

⁵⁴ 闕紅柳將此書歸為同陞閣書鋪刊印，可能因為乾隆朝同陞閣的摺紳錄都有葉一棟的序；見闕紅柳，〈清代縉紳錄的內容、特點與史料價值探析〉，頁 167。

劉錚雲

六·書鋪承辦吏部進呈摺紳

行文至此，本文利用檔案資料說明了官刻摺紳，也就是吏部按季進呈摺紳的來龍去脈。但有資料顯示，吏部按季進呈的《爵秩全覽》有可能是由書坊刊刻的。榮陞堂刊刻的道光十六年（1836）夏季分《大清摺紳全書·中樞備覽》上刊了一則啟事：

本堂開設京都前門外楊梅竹斜街，承辦吏部進呈摺紳。一切陞調選授逐日赴部，當官校對，與部存官冊相符，一無舛錯，方可裝潢成帙，按季進呈。非同私探信息，翻人舊本者，真偽、難易大小相同，是以費用工本較量，不能減價而售。盼公買書，必須詳加查考，訊無舛錯，再行賜顧。幸勿圖謀，而為私利所誤也。本堂書面另刊承辦吏部進呈官本摺紳戳記，與眾不同。如無此等字樣，則係私板。謹具辨帖一幅，以杜魚目之混珠，望賢大夫鑒之。

這張啟事旨在表明，榮陞堂因為承辦吏部進呈摺紳御覽業務，所有資料必須與官方檔冊相符，方裝訂成冊，按季進呈。因此它的資料不能與私探信息、翻人舊本的書鋪相提並論，價格自然較高。這張啟事明顯是因應書鋪間價格競爭而產生的文字，強調資料來源的可靠性，企圖說服顧客以較高的價格購買。榮錄堂刊印的光緒十五年（1889）春季分《大清摺紳全書》在封面上刊出其售價：

| | |
|-------|--------|
| 白紙文摺紳 | 六錢四分 |
| 白紙武摺紳 | 白 三錢二分 |
| 每部市 | |
| 袖珍文摺紳 | 銀 三錢二分 |
| 袖珍武摺紳 | 一錢六分 |

一本摺紳索價超過白銀半兩，價格不低。可惜，榮陞堂未刊出其售價，無從比較。當然，榮錄堂也有可能是光緒朝承辦吏部進呈摺紳的書鋪，只是未見其啟事。榮陞堂的這張啟事是個人所見的唯一的一張。如果榮陞堂確是承辦進呈御覽業務，不是為提高售價而擅發啟事，則吏部可能是在彙齊中央各部院的資料後，將刊刻等作業交由書鋪承辦，書鋪刻完後，「逐日赴部，當官校對，與部存官冊相符，一無舛錯，方可裝潢成帙，按季進呈」。

如果吏部按季進呈的《爵秩全覽》的確是由書坊承辦，這樣的作業方式始於何時？目前由於缺乏資料，無法斷定。清末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曾提及，

「此書（案指摺紳錄）版權初為吏部書吏某所專有，蓋在乾隆末造和坤當國時，某以數千金賄坤，始禁止他人發行，久之而為各南紙鋪所效尤」。⁵⁵ 徐珂沒有說明這段文字的根據。這吏部書吏某專有摺紳錄版權的傳聞，有無可能其實最初是，乾隆末年琉璃廠書鋪透過這位吏部書吏取得吏部進呈摺紳業務的承辦權，久而久之，經過幾代的轉手傳播，最後變成了《清稗類鈔》的版本。如果這個推測可以成立，或可說明何以目前除了前面討論過的為準備進呈摺紳而知會各部院的動作外，不見吏部有其他相關作為的文獻，僅知光緒三十一年（1905）以後，吏部文選司始新設摺紳處；宣統三年（1911），改由內閣新設之印鑄局編印摺紳錄。這種由書坊刊刻的作業方式可能自乾隆末年以後一直持續到帝國結束。根據常識判斷，榮陞堂應無可能壟斷有清一代的摺紳業務，當有不少北京琉璃廠的書鋪承辦過吏部的進呈業務。清末民初人袁鮫在其所輯〈琉璃廠坊肆匾額錄〉中，曾記錄榮陞堂與榮祿堂的鋪名匾額；前者是「榮陞堂摺紳鋪」，而後者是「榮祿堂縉紳局藏書處」。⁵⁶ 這兩塊匾都將「摺紳」（「縉紳」）兩字帶入鋪名中，而且是袁鮫所記八十七塊坊肆匾額中僅有的二塊。如果榮陞堂因為承辦吏部進呈摺紳而將「摺紳」二字帶入鋪名中，則由於榮祿堂的鋪名匾額中也帶有「縉紳」二字，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認定這個從康熙朝即曾刊刻摺紳錄的榮祿堂也曾經承辦過進呈摺紳的業務？這些推測當然都有待進一步的驗證。

這種中央官方業務委由民間商人辦理的方式看似突兀，但在清代不乏先例。根據呂小鮮的研究，原本應由各省駐京提塘親赴六科抄發刷印邸抄的業務，自乾隆初即改為由民間報房抄發，提塘轉買抄報的方式。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後，雖然一度改由各省提塘共同設立公報房，抄錄刷印邸抄，但三十九年以後，又改由各省各設報房抄發。乾隆末到道光的發展雖然不清楚，但確信到咸豐初年，刊刻邸抄早已是民間報房的業務了。⁵⁷

如果抄發各省的邸抄可委由民間報房刷印，刊印進呈摺紳的業務委由民間書鋪承辦自無不可。因此，嚴格說來，摺紳錄並無官刻與坊刻之分，因為吏部進呈的《爵秩全覽》其實也可能是書坊刊刻的，只是它經過了官方的彙整與校對程序。當然琉璃廠書鋪與官府之間究竟存在甚麼樣的關係仍有待我們進一步的探究。

⁵⁵ 徐珂，《清稗類鈔》，〈爵秩類〉，「爵秩全函」條。

⁵⁶ 袁廟祝鮫，〈琉璃廠坊肆匾額錄〉，孫殿起，《琉璃廠小志》，頁38-44。

⁵⁷ 呂小鮮，〈有關清代邸抄的三個問題〉，《清史研究》2000.1：91-96。

七·餘論

本文從吏部進呈摺紳御覽的角度切入，檢視清代摺紳錄的刊行，說明吏部進呈御覽《爵秩全覽》與書鋪刊印《摺紳全書》的關係與過程。上文引述費南英的奏摺，他觀察到外省官員或民眾離京，都會買本摺紳錄回去，每年有數萬本的印量；徐珂也說，官員進京，都會購買一本，俾便回去饋贈親友。⁵⁸顯然，摺紳錄在清代頗受歡迎，可以用來當作禮物饋贈。在前言中，我約略談了一點現代史家認為摺紳錄的功用，在本文最後讓我們看一下當時人是如何利用與看待摺紳錄的，何以會如此受歡迎。清末民初人朱彭壽（1869-1950）對此有精要的描述：

《摺紳錄》一書在刊行時，第為緝檢當代中外官員人名而設，一經更調，便如明日黃花矣。然閱數十年或數百年，舊時人物，凋謝無遺，後之人瀏覽遺編，每足為徵文考獻之助。故得之者輒加以題識考證，往往視如古籍，什襲珍藏焉。⁵⁹

對當代人而言，摺紳錄冊提供了查考中央與地方官員名姓的功能。當代人可藉此瞭解官場動態，章回小說《歧路燈》中提及，一位老童生在友人家中的《爵秩新本》上見到族兄已晉陞荊州知府的訊息。⁶⁰一件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十一日（1784/10/24）吏部移會稽查房的抄件透露，政府官員其實也仰賴《爵秩全覽》查考官員資料。這件抄件雖未具名，但據其內容判斷，應當是當時的戶部尚書兼管吏部事務的和坤的摺子，內容是：

查王樓由進士於乾隆四十六年八月銓選甘肅通渭縣知縣。其時皇上巡幸木蘭，經留京王大臣驗放其《爵秩全書》內刊刻特授字樣，但吏部司員未能校出，殊屬疏忽，應請旨將該司員交都察院察議。⁶¹

「其時皇上巡幸木蘭」指的應是乾隆四十九年五月間，乾隆皇帝駐蹕熱河。遠在熱河的乾隆為何要在京大臣驗看《爵秩全覽》，而發現吏部司員校對疏忽之事？原來就在五月間甘肅省回民聚眾攻打通渭縣城。知縣王樓「因畏死先行逃匿」，「在後園中倉房藏匿」。⁶²王樓先是被革職，交刑部治罪，而當刑部定擬斬決，

⁵⁸ 徐珂，《清稗類鈔》，〈爵秩類〉，「爵秩全函」條。

⁵⁹ 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五，頁254。

⁶⁰ 李綠園，《歧路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八十六回，頁896。

⁶¹ 〈明清史料〉，登錄號272804-001。

⁶²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一二〇七，頁18b, 20b。

請旨就地正法時，乾隆皇帝諭令將其解至行在，「親行廷鞫，加以杖夾，令其羞辱」。⁶³ 他在上諭中強調，「王樓係現任縣令，且係進士出身；讀書明理，豈不知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為古今通義」。⁶⁴ 顯然乾隆皇帝為了瞭解王樓的出身，而要在京大臣察看《爵秩全覽》；而當他得知貪生怕死，不能與城共存亡的王樓是進士出身時，更是憤怒難遏，因為在他心目中，作為守土之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乃義所當然，遂諭令將王樓押至熱河，親自審問，既杖且夾，羞辱一番，以洩心中之怒。

查考官員名錄固然是摺紳錄的重要價值，但摺紳錄更吸引人之處應是其收藏價值。前述紀昀收藏的摺紳冊上的題跋、題詩清楚顯示，年代久遠的摺紳錄也像稀珍文集、詩集一樣，成為文人雅士相互酬唱賞玩的珍品，冊中如有先人的名銜，則更是珍貴，當然也就成為時人爭相收藏對象。根據丁嘉葆的記載，韓泰華在收藏順治摺紳冊的同時，也藏有「康熙間摺紳本」。⁶⁵ 如果藏有康熙年間的摺紳錄值得拿出來與順治朝摺紳冊並提，顯然乾嘉以下至道光年間，康熙朝的摺紳錄已經很稀罕。這可以解釋為何現今圖書館不見康熙朝摺紳錄。⁶⁶

其實匯聚多人題跋的摺紳錄並不限於紀昀收藏過的順治十八年摺紳冊，晚它一百六十年的《道光五年乙酉夏季摺紳錄》上也有人題跋。章鈺 (1865-1937) 在其跋語中指出，這本浙江嘉興海鹽人朱旭辰所收藏的摺紳錄有時人胡鼎彝 (1854-1926) 的題跋；他的題跋不僅是「今日掌故中 useful 之書」，而且還「數摺紳之見存者，明嘉靖而外，有李若農藏順治朝一本，桐鄉勞氏藏雍正朝一本，錢塘吳氏乾隆壬辰年一本」。⁶⁷ 顯然，到了同光之際，道光朝的摺紳錄也成為收藏的

⁶³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二一四，頁 7a。

⁶⁴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二一四，頁 7b。

⁶⁵ 潘祖蔭，《滄喜齋藏書記》卷一，〈順治十八年摺紳冊〉，頁 32b。

⁶⁶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山西日報》報導，山西徐繼畲研究會會長任復興於二〇一一年在太原舊貨攤上購得一本康熙朝摺紳錄。他指出，這本摺紳錄書坊刻於康熙五十六年 (1717) 丁酉秋七月初。可惜，他未明指是何書坊所刻。他也指出這本摺紳錄較乾隆以後的簡略，全書僅有七十七頁；「前面僅用 56 頁，就開列了京師內閣、各部院寺以至九門統領等大小官員。隨後 21 頁，開列了駐各地正副都統，和盛京、奉天、直隸、江南等地文武官員。」山西新聞網《山西日報》2013.07.12 (<http://www.daynews.com.cn/sxrb/cban/C3/1831689.html>，檢索 2013.11.05)。根據他的描述，康熙時期的坊刻摺紳錄文武職似尚未分冊。

⁶⁷ 章鈺，《四當齋集》(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三，〈道光五年夏季摺紳錄跋〉，頁 13。

劉錚雲

對象，而且與收藏雍正、乾隆兩朝的摺紳錄一樣，也是值得炫耀之事，因為已不多見。

至於對當今研究者而言，摺紳錄有何重要性？我在前言中曾提到，有學者認為摺紳錄是很有價值的傳記史料。其實，翻檢摺紳錄，不難發現，這些名錄也提供了瞭解清代琉璃廠書鋪刊印書籍的線索。茲舉一例，以說明書鋪如何在不變動原有版心頁碼的情況下，增加篇幅。檢視現存摺紳錄，我們會看到，通常書鋪是在原來頁碼數字前加上一個「又」字或「前」字，也有在數字中間加上一個「又」字。例如，來鹿堂刊刻的光緒十八年（1892）秋季分《大清摺紳全書》就在〈內閣〉之後加進了〈軍機處〉，又在〈步軍統領衙門〉之後增加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於〈內閣〉部份最後一頁的頁碼是「元 八」，〈軍機處〉部份的首頁頁碼變成「元 又八」，次頁頁碼則是「元 前九」，因為後續原來〈翰林院〉首頁的頁碼是「元 九」；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首頁頁碼是「元 一百又四」，次頁是「元 一百又又四」，因為前面的〈步軍統領衙門〉的頁碼是「元 一百四」。但也有書鋪不是這麼講究頁碼的鑑別作用。例如，榮錄堂刊印的光緒十六年春季分《大清摺紳全書》，〈步軍統領衙門〉之後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頁碼都是「元 一百又四」；由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篇幅有三頁，所以這本摺紳錄一共有四頁的「元 一百又四」。瞭解清代書鋪有這樣的作業方式，對日後判別摺紳錄的前後出版關係當有助益。

最後，必須指出，要全面掌握這些書鋪的刊刻作業恐怕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例如，上述軍機處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人員名錄的增加，其實來鹿堂在其光緒十四年秋季分，以及榮錄堂在其十五年春季分的《大清摺紳全書》中就已經看見。但不僅這兩本摺紳錄的凡例未見相應的更動，而且要到光緒二十二年以後刊印的摺紳錄的凡例中才見提及：軍機處、總理衙門原本未載，今一併刊列，俾閱者一覽無遺。⁶⁸ 換言之，摺紳錄內容的更動與凡例的變動有七年的差距。原因為何，尚待來日再探。

（本文於民國一〇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收稿；同年十二月十七日通過刊登）

⁶⁸ 光緒二十二年以後的凡例一共增加了二個條目，另一目的是：各部院額外司員均按現在供職者刊入；如有銷假、起服，以及續行到署各員，隨時增添，以歸覈實。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 《大清職官遷除全書》，乾隆二十九年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大清職官縉紳全書》，乾隆三十年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內務府爵秩全覽》，光緒年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爵秩新本》，乾隆二十九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爵秩新本》，乾隆二十九年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方濬師，《蕉軒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 王春瑜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一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
- 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吳玉綸，《香亭文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51冊。
- 李綠園，《歧路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 易順鼎，《順治丙戌搢紳錄略》，收入氏著，《琴志樓叢書》。
- 法式善，《清秘述聞》，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徐珂，《清稗類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 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編，《清代縉紳錄集成》，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章鈺，《四當齋集》，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926冊。
- 鄭澐修，邵晉涵纂，乾隆《杭州府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01-703冊。

劉錚雲

二·近人論著

呂小鮮

2000 〈有關清代邸抄的三個問題〉，《清史研究》2000.1：91-96。

秦國經

199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孫殿起、雷夢水

1982 〈記廠肆坊刊本書籍〉，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袁廟祝鮀

1982 〈琉璃廠坊肆匾額錄〉，孫殿起，《琉璃廠小志》。

張秀民

1979 〈明代北京的刻書〉，《文獻》1979.1：298-309。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

2006 《中國印刷史（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張英宇

1984 〈清代摺紳錄略考〉，《文獻》1984.1：116-124。

張涵銳

1982 〈琉璃廠沿革考〉，孫殿起，《琉璃廠小志》。

馮立昇

2008 〈前言〉，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編，《清代縉紳錄集成》，鄭州：大象出版社，第1冊，頁1-8。

馮爾康

2000 《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

1996 《筑波大學和漢貴重圖書目錄》，茨城：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

劉薈

2008 〈榮錄堂與清代摺紳錄之出版〉，《圖書館雜誌》2008.10：63-68；後收入氏著，《清華園裡讀舊書》，長沙：岳麓書社，2010，頁187-202。

鍾少華

2010 〈支離破碎的《清代縉紳錄集成》〉，《博覽群書》2010.10：66-68。

闕紅柳

- 2012 〈清代縉紳錄的內容、特點與史料價值探析〉，《清史研究》
2012.2：146-149。
- 2013 〈縉紳錄與清代北京〉，《北京檔案》2013.10：55-57。

三·網路資訊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index.html>。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http://www.lsdag.cn/dacx/index.jhtml>。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資
料庫」，<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GC/indexcg.html>。
- 山西新聞網《山西日報》2013.07.12，[http://www.daynews.com.cn/sxrb/cban/C3/18316
89.html](http://www.daynews.com.cn/sxrb/cban/C3/1831689.html)（檢索 2013.11.05）。

劉錚雲

Publication of *Jinshenlu*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Quarterly Submission for Imperial Review

Cheng-yun L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the Qing dynasty, civil official registers and military officer registers were compiled as separate volumes.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civil official registers, titled *Jinshen quanshu* (摺紳全書) and *Juezhi quanlan* (爵秩全覽) respectively, whereas there was only one kind of military officer registers titled *Zhongshu beilan* (中樞備覽). Together the three were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Jinshenlu* (摺紳錄) or *Jinshence* (摺紳冊). By examining the *Jinshenlu* publication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compiled and submitted *Juezhi quanlan* quarterly for imperial review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ublication of *Jinshen quanshu* in the Qing dynasty.

In March 2, 1773, Fei Nanying (費南英), an Investigating Censor of Jiangnan Circuit, submitted a memorial urging the Emperor to forbid the bookshops from privately publishing unauthorized copies of *Jinshenlu*. The Emperor accordingly ordered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and that of War to periodically collect and revise the information about civil officials and military officers that were in office, including their names, titles, birth places, and dates of their assumption of offices. The information was then compiled into an official copy of *Jinshenlu*, which would then be submitted to the emperor for imperial review on a quarterly basis, and lastly, distributed to bookshops for making authenticated duplications for sale. Scholars in the past had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in fact official imprints of *Jinshenlu* as well as unauthenticated private imprints of *Jinshenlu* by the bookshops, but none of them paid any attention to how the imperial review proceeded and the role that *Juezhi quanlan* played in this process. Beginning from Fei's memorials, this essay shows why there was this quarterly imperial review, and how the registers were compiled and submitted for review. It also examines how the bookshop imprints of *Jinshen quanshu* were printed out. In addition,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the essay discusses when the extant Ming and Qing *Jinshenlu* appeared, and how they were published by the bookshops in the Liulichang ward in order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n *Jinshenlu*.

Keywords: *Jinshenlu*, *Juezhi quanlan*, *Jinshen quanshu*, *Zhongshu beilan*, Fei Nanying